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主编／潘懋元

副主编／史秋衡

第4卷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中國高等教育評論



第一輯 中國高等教育評論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4卷

主编/潘懋元 副主编/史秋衡

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杨玲玲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4卷 / 潘懋元, 史秋衡主编.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41-8212-8

I. ①中… II. ①潘… ②史… III. ①高等教育—研
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2463 号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4卷)

ZHONGGUO GAODENG JIAOYU PINGLU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363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272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编委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玉琨	华东师范大学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刘海峰	厦门大学
潘懋元	厦门大学
史秋衡	厦门大学
王洪才	厦门大学
邬大光	厦门大学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
杨广云	厦门大学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序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集刊依托厦门大学高教中心/教研院的高水准高等教育研究与交流平台，坚持“创新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探寻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研讨高等教育重大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以高质量的中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特色，探讨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

集刊每年出版一卷。前两卷主要以每年一次的厦门大学高教中心/教研院高水准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论文为基本稿源。为进一步发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先导作用，搭建国内外高等教育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从上卷（第3卷）起，集刊面向全国公开征稿，吸引了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者踊跃投稿。本卷稿件主要为中外著名专家学者的特邀稿及优秀博士毕业生博士学位论文摘编稿，汇集了当代高等教育界优秀专家学者的思想智慧。

本卷（第4卷）包括三个学术专栏，主要发表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重要学术观点。第一个专栏对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思考，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反思、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张与机制转变、全球化与中国大学模式、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与路径等问题。第二个专栏就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考试的相关热点问题各抒己见，如学科教学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学生创业意向、大学生学习经验调查、大学生学习满意度、高考改革、高考公平等。第三个专栏探讨了国际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与经验，如日本短期大学的危机、美国社区学院的市校合作模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教育课程改革案例等。

衷心感谢诸位专家学者不吝赐稿，他们关于高等教育转型与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考试、国际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力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快速发展。

征稿启事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教育科学出版社定期出版的教育学科学术集刊，创办于2010年，主编为潘懋元，副主编为史秋衡，编委会委员（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包括陈玉琨、顾明远、刘海峰、潘懋元、史秋衡、王洪才、邬大光、吴康宁、杨德广、杨广云、钟秉林。集刊依托厦门大学高教中心/教研院的高水准高等教育研究与交流平台，以高质量的中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特色，主要刊登反映高等教育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高水平论文和研究报告，探讨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

自2014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评论》每年出版两卷，每卷收纳高水平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7—8篇，面向全国公开征稿，内容涉及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史、比较与国际高等教育等。欢迎各位关注高等教育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同仁惠赐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1. 文稿字数以8 000—12 000字为宜，个别优质稿件不受字数限制。
2. 稿件体例：稿件内容依次包括标题、作者姓名、摘要（中文摘要2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关键词之间以一字空分隔）、文章内容、参考文献、作者信息（包括姓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工作单位和详细通信地址、邮编、电话）。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请译成英文，置于文章最后。
3. 所投稿件如有基金资助，请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编号。
4. 文章标题一般分为三级，第一级标题用“一、”“二、”“三、”标示；第二级标题用“（一）”“（二）”“（三）”标示；第三级标题用“1.”“2.”“3.”标示，标题符号前空两格。请按层级逐级下延。
5. 注释一律在本页使用脚注，每页重新排序，用①②③……表示；引文务必注明出处，采用“著者—出版年制”，即一律用括号在文中相应位置标明责任人及出版年，并将所引用页码以上标的形式标注在括号外，完整的参考文献条目放在文末，按照先中文后英文的顺序排列，以拼音/字母为序。
6. 作者应保证论文符合学术规范，无抄袭、剽窃、侵权、数据伪造等不端行为，不涉及国家机密。编委会对稿件进行修删，如不同意请在稿件中声明。
7. 本评论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两卷，出版时间为每年6月和12月。投稿截止日期分别为1月1日和7月1日，截止日期后一个月内告知作

者录用与否。

8. 本评论出版前，文章已经在其他公开出版物或者互联网上发表的，请务必及时告知本评论编委会，否则一切后果由作者本人承担。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秋衡（负责人）；王玉梅（秘书）

打印稿请寄至：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编辑部（邮编：361005）

电子文本（*.doc 格式）请发至编辑部邮箱：qhshi@xmu.edu.cn（史秋衡）；yumeiwan@xmu.edu.cn（王玉梅）

联系电话：0592 - 21892226；0592 - 2180536

传真：0592 - 2189065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编辑部

2013 年 12 月

目 录

—— 高等教育转型与发展 ——

对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的反思/杨德广/3

中国高等教育的机制转变与规模扩张/阎凤桥 毛 丹/29

全球化与中国大学模式问题/王洪才/43

我国高等教育 2049 发展蓝图、指标、挑战与实现途径/洪成文 刘慧珍/55

——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考试 ——

学科教学论：知识生产与身份建构/刘正伟 王文智/69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析/翟海魂/79

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 9 所高校大学生调查
数据的分析/陆根书 彭正霞/88

大学生学习经验调查的理论基础/吴 凡/123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 静/134

高考公平与应试主义/周 序/145

论高考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目标原则及推进策略/李木洲/155

—— 国际与区域高等教育 ——

日本短期大学的危机/[日] 天野郁夫/169

美国社区学院的市校合作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连进军/185

国际高等工程教育课程改革案例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CDIO 课程
模式/崔 军 汪 霞/194

区域现代化背景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李家新/208

高等教育转型与发展

对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的反思

杨德广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跨越式地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这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诸多不同的看法，值得深入探讨和反思。本文剖析了八个问题并阐述了笔者自己的观点：一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动因；二是中国是否需要那么多研究型大学；三是如何看待民办高等教育；四是高教“去行政化”势在必行；五是是否需要取消学校等级制；六是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问题；七是如何实施“宽进严出”制和淘汰制；八是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改革现行教学制度。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反思

中国高等教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市场经济的大潮，30多年来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1999年扩招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提前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6.8%发展到2002年的15%，2012年已达到30%。（教育部，2013）各类高校有2700多所，在校大学生逾3000万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教育阶段，不仅是量的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管理的飞跃。我们的教育理念、管理方式、体制、机制等，都应随之而变，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精英教育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反思，本文列举了八个问题进行剖析，阐述个人管窥之见，期盼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动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跨越式进入大众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学界及社会上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是采取“经济主义路线”、“GDP为主导”，“在教育产业化导向下发展起来的”（陈先哲，2012），是不正常的，是教育的“大跃进”、“大冒进”。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和判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对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即1999—2006年的扩招),要客观分析。

1998年,我国高校在校学生仅为642.99万人,毛入学率为6.8%,招生数为108.4万人。经过8年扩招,2006年在校生达到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2%,招生数为546万人,平均年招生增长率为16.1%。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应实事求是地从多视角去考察、分析。

首先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缓慢而导致的后发效应。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高校仅有205所,在校大学生11.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0.26%。30年后即1978年,在校大学生也只有132万人,毛入学率为1.56%。当时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强调抓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把教育当作上层建筑,当作消费部门、福利事业,“四人帮”还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甚至倒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人才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各行各业都感到人才紧缺是制约发展的瓶颈。邓小平对我国人才紧缺深为忧虑,早在1978年就严肃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缺乏人才”,“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他明确提出,我国的教育事业要有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搞好教育和科学,我看人才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就确立了教育“重点发展”、“优先发展”的地位,但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只顾抓经济,不重视抓教育。针对这一状况,邓小平多次批评:“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邓小平还批评:“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大声疾呼:“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1993)正是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大声疾呼,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邓小平教育优先论为我国高教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我国高教大发展的第一个动因。

1981—1985年,我国高等教育有过一波发展的小高潮。5年内新增高校312所,在校生增加了122%,毛入学率提高到2.8%。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发展势头未能持续下去。教育主管部门及时“刹车”,提出要“稳妥”发展、“适度”发展。1986—1998年1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明显放慢。“教育优先”没有真正落实。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没有放慢,每年的GDP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发展越快,对人才需求量越大。当时,我在上海市高教局工作,负责全市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供需矛盾非常突出。社会各方面急需各类人才,但高校毕业生很少,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有些专业的毕业生只能满足用人单位

需求的1/10,迫切需要多招大学生。据我所知,上海周边经济发达的省市对人才需求更为迫切,纷纷到上海高校来要毕业生,但多数是空手而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因人才紧缺,高校便“擅自”扩招,背着教育部突破招生计划,受到教育部批评,但这并没有制止扩招之风的蔓延。这是我国高教大发展的第二个动因。

第三个动因是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到知识的作用、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人才是第一资源”,越来越深入人心,再加上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广大家长都希望把子女送到大学接受高等教育。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家庭积蓄的目的和去向”,有65%的人表示用于子女上大学,占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分别是购房和医疗。在多子女以及经济不发达的状况下,人们对于上大学的欲望并不强烈,而在独生子女和知识经济时代,家长对子女的期待值提高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增强了,急切地期望把他们培养成才,对高等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而对高等教育发展太慢、高校招生太少很不满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于1999年6月召开了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在会上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上大学的需求”,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发展。显然,我国高校扩招并非“产业化思潮的产物”,而是邓小平“教育优先”理论的产物,我国经济大发展的产物,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迫切需求的产物。

如何评价我国上世纪末的高教扩招?对此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我国高教扩招,导致“高等学校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造成教育质量滑坡,大学生就业难等突出问题”。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和高校确实存在,但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人才相比,与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贡献相比,与高等教育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上大学的需求相比,是次要的、非主流的。对这三方面的问题也要做具体分析。“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问题,可能是指有些民办高校收费高了,贫困生增加了。但应该看到,高校规模扩大了,包括公办高校的规模也扩大了,满足了更多学生上大学的需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扩招,将有许多贫困生没有机会上大学。表面上看,扩招后贫困生多了,实际上是贫困生上大学的人多了,这是好事,并非坏事。高校出现贫困生阶层,总比把贫困生关在高校大门之外要好。何况对于“不让一名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庄严承诺,从政府到各高校都是切实、努力地去履行的。关于“教育质量滑坡”问题,我认为教育质量是多元要素组成的,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说质量滑坡。扩招后,不少学校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师资、校舍、装备不足,的确遇到了质量问题,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抓发展、抓改革不断加以解决,事实上许多地区和高校已取得明

显成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中毕业生变成了大学毕业生。从整体而言,质量肯定提高了,倘若不扩招而把几百万中学生关在大学校门之外,质量更不高。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从表面上看,由于高校扩招,近年来每年有600多万大学毕业生,的确对就业市场压力很大,但深入考虑,600多万人是客观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如果大学不扩招,可能每年只有300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肯定要小一点。但另外300万高中毕业生也有一个就业问题,也会给社会就业市场带来压力。让他们上大学,使他们在知识、能力、整体素质等方面有所发展,有所提高,相比高中毕业生找工作会更容易一些,而且不少人具有了创业能力。我国高校毕业生从总量来看并不多,仍满足不了经济大国的需要,因为至今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仅为30%,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就业难的主要症结在于人才结构的矛盾,以及就业渠道不够畅通,为此应从调整高校专业结构、高校合理布局和正确定位着手。

有些人批评高校扩招“导致了包括公办大学大规模举债、大建大学城”,严厉指责中国高校在扩招中借债2600亿元,是严重失控,是“败家子”。笔者对那些不做深入调查研究就空发议论、横加批评的人深表遗憾。我认为许多高校,包括公办和民办高校为了多招一些学生、多为社会培养人才,在扩招过程中挖掘潜力、节省开支,甚至牺牲教职工(包括校领导)的福利待遇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这种精神是十分崇高和伟大的,其中不少高校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从银行贷款,少则二三亿,多则七八亿,用于征地、建设校舍,改善办学条件,加快了高校发展速度,每年节衣缩食地从学费中抽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付息。学校领导及教职工们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少有的,他们应该得到颂扬和鼓励,不应该受到无端指责和批评。高校扩招,以及新建大学城、大学园区都是利在千秋、功德无量的伟业。“增加一所学校就是减少一座监狱。”他们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不是为个人谋取私利。试想,如果不扩招,不建大学城、大学园区,大量的土地将被那些所谓的“开发商”们用来建高价房屋而谋取私利。有些人只盯住高校举债两千多亿元,却没有看到扩招后高校增值一万多亿元。当时国家经济拮据,许多高校自行贷款办学,既为国分忧又为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何罪之有?地方政府虽然资金不足,但从政策上支持高校贷款办学,是明智之举。据悉,近年来广东、江苏和上海等地政府正在帮助高校归还贷款,体现了负责任政府的自觉。只批评“大规模举债”而不看效益和增值,是不公正的。就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当校长期间而言,从1996年到2003年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学校总资产从2.2亿元发展到12.66亿元,增加10.37亿元,增幅为475%。截至2011年,学校总资产又增加到24亿元,而全校贷款为2.9亿元。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规模扩大了。从1995年的全日制在校学生8200人、研究生170人、夜大学生950人、长期留学生150多人,发展到2003年的全日制在校生

2.3 万人、研究生 1 700 人、夜大学生 1.2 万人、留学生 360 人。本、专科招生数从每年 1 000 多人发展到 6 000 多人，博士点从 2 个发展到 14 个，硕士点从 20 多个发展到 65 个。又如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民有民办）建校初期资产为 2 亿元，现在总资产已增加到 5 亿元，贷款为 0.5 亿元。已培养毕业生 5 000 多人，在校生有 4 000 多人。

二、中国是否需要那么多研究型大学

1998 年 5 月，党中央提出要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后来称之为“985 工程”大学，即研究型大学、自主创新型大学，主要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原定建设“若干所”，顾名思义最多不超过 10 所，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后来在申报、审批过程中，远远超过了“若干所”，发展到了 39 所，加上部委所属的“985 工程”大学，共 45 所，显然是过多了，这是因为没有定出严格的、科学的“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没有严格评审。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办这么多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一所高水平的一流研究型大学，绝非投资几十亿就够了，而是要投几百亿，几千亿，让这些大学有实力到全世界招收最优秀的人才，购置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中国的大学之所以难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就在于缺乏大师级教授和科研人员，缺乏先进的设备，缺乏足够的教育投入。不能确保“一流大学”的建设，就难以建成真正的“一流大学”。如对列入“985 工程”的每所高校，国家仅投入 3 亿元，地方政府配套 3 亿元，共 6 亿元，岂能建成一流大学？！

从中国的国情看，建设“若干所”研究型的一流大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类大学主要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从事高水平原创性科学研究。从国外情况看，80% 的一流高级人才都毕业于少数的一流大学（如美国在 20 所以内），由此可见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性。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创新型的大师级人才，因此有必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扶持这些大学，包括精英人才集聚、经费集中投入，把一些一流的科研中心、先进的仪器设备建在这些大学，尽快让它们成长、发展。每年的经费投入不是几个亿，而是几十亿、几百亿，让这些大学有实力到全世界招聘最优秀的人才，购置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承接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攻关项目，培养最优秀的人才。为了稳定教师队伍，要大力提高这些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让他们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从事教学、科研和育人的工作。对这些大学的考核应着重于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两方面，不可只重视出成果不重视出人才。

然而，我国要办三四十所研究型大学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有“若干所”（最多十几所）即可，大多数“985 高校”应立足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因为我国